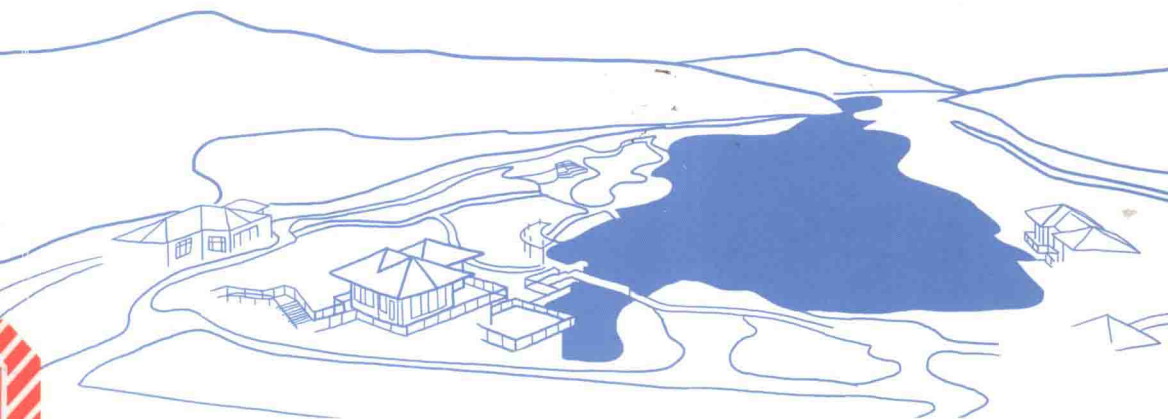


这就是 我想过的生活

车 凤
王树兴
著

I WANT THE LIFE LIKE THI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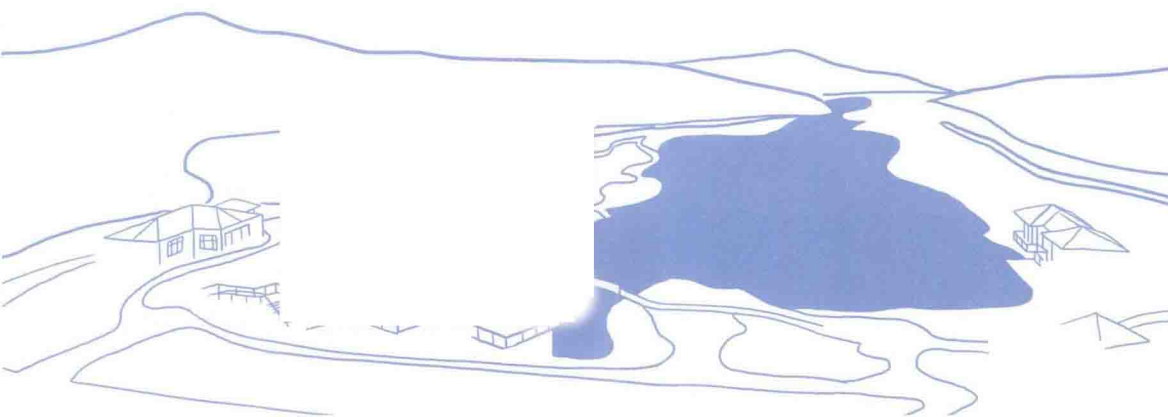


中国致公出版社
China Zhigong Press

这就是 我想过的生活

王树兴 车凤
著

I WANT THE LIFE LIKE THIS



中国致公出版社
— China Zhigong Press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这就是我想过的生活 / 车凤, 王树兴著.

— 北京: 中国致公出版社, 2016

ISBN 978-7-5145-0984-7

I. ①这… II. ①车… ②王… III. ①纪实文学—作品集—中国—当代②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17.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211363号

这就是我想过的生活

车凤 王树兴 著

责任编辑: 董拯民 张洪雪

责任印制: 岳 珍

出版发行:  中国致公出版社
China Zhigong Press

地 址: 北京市朝阳区八里庄西里100号住邦2000商务中心1号楼东区15层

邮 编: 100025

电 话: 010-85869872 (发行部)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小森印刷 (北京) 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1000mm 1/16

印 张: 20.5

字 数: 300千字

版 次: 2016年10月第1版 2016年10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48.00元

版权所有, 未经书面许可, 不得转载、复制、翻印, 违者必究。

我想和你一起生活在某个小镇

我想和你一起生活在某个小镇，
一起饮用那无尽的黄昏
和连绵不绝的钟鸣。
在小镇的旅店里——
古老的钟敲出渺茫的响声
像轻轻嘀嗒的时间。
黄昏，偶尔有人在顶楼的某个房间
倚着窗子吹笛。
窗口盛开着大朵大朵的郁金香。
——此时如果你不爱我，我也不会介意。

（作者：茨维塔耶娃）

序 言

（一）我们都在寻求一种活法

稻盛和夫有一本很精彩的书，名字就叫《活法》。仔细想来，身边所有的美满与不幸、健康与疾病、宽和与狭隘、激昂与落寞、苛责与感恩、确认与否定……莫不是与我们的活法有关。

冯友兰先生曾经把所有的人生境界分为四类：第一种人活在“自然境界”中，比如原始人和婴孩。他们只是依靠本能生存，没有“觉解”，饿了就吃困了就睡，没有太多的奢望也没有什么复杂的思想，当然，更谈不上什么人生意义。第二种人活在“功利境界”中，他们做事情有着明确的功利目的，只去选择那些对自己有好处的事情，带有明显的利己主义倾向。当然，这



种利己不见得一定对他人产生损害。第三种人可以活到“道德境界”，他们能够认识到自己是社会整体的一部分，用儒家的话讲是“正其义不谋其利”的，他们做事会遵循一种道德标准。第四种人，是人类群体中境界最高的，他们能够意识到在人类社会的整体之上，还有一种更大的存在，就是宇宙，所以这种境界叫作“宇宙境界”，也叫“天地境界”。

事实上，任何人的活法，都是由他所拥有的人生境界所决定的，活法的背后就是我们对于生活、生命、自然、宇宙的看法。它归根结底是一种价值观，是一种人人在用毕生寻找和确认的密码。固然一个人的活法会受到很多现实条件的制约，但是多数人总还是有的选择。我们身边的每一个人，从健身、旅行、搬家到换工作、出国留学、做志愿者，甚至于相亲，这一桩桩一件件大大小小的事情，无一不在体现一个人对于自己活法的选择和追求。

作为中国古人的“四书”之首的《大学》，其开篇就讲：“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这里的“止”，不是停止，而是人生的目标和方向，我们选择何种活法，是由我们的“止”决定的。我们这本书，本质上也是两个作者在寻找、尝试和确认一种活法。

（二）物质时代的罪与苦

被称为“最后的儒家”的梁漱溟先生认为，人类面临着三大问题，顺序错不得，先要解决人和物之间的问题，接下来要解决人 and 人之间的问题，最后一一定要解决人 and 自己内心之间的问题。从这个角度讲，我们对于生活的讨论，其次序必定要从人和物之间的关系开始。

人与物的关系，一是人与环境的关系，另一个是人与物质的关系。

中国人讲究“天人合一”。《周易》上说：“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中国文化和价值观念的核心之一就是“和”字，不仅是人与人之间态度的和善，更有人与环境、自然宇宙的和谐、应和。然而，时至今日，我们所看到的却是太多不和谐的音符。人们对于环境的破坏已经产生了有目共睹的严重后果，绝大多数中国人都在遭受环境污染的困扰和罪苦。

从冯友兰先生划分的“人生四境界”不难发现，处在自然境界和功利境界中的人是依照本能，为了满足自己的私利做事，所以他们必定是狭隘和自私的，有时也是非理性的。对他们而言，人对于外物就是占有和使用的关系，他们看不到人只是万物的一个小小局部，表现出贪婪和自我，且鼠目寸光，难以关注到更多人，包括他们的子孙后代的长远利益和福祉。事实上，所有对环境施加了负面影响的个体，本身也在承受着自己不明智行为带来的后果。洁净和安全的空气、水、粮食，这些都是人类最基础的需要，而我们现在却并不能轻易享用到它们。

物质的丰富和精神的充实并不总是在同一方向上，有时甚至背道而驰。近代以来，随着西方工业化的高速发展及其向世界迅速推广，世界各处都出现了重科技而轻人文的异化倾向。人们关注的重心就是在科技推动下去改变外在世界，与此同时，却忽视了对人的精神需求的关注。有人曾经这样总结社会几十年来的发展：前三十年人们发现了斗争，后三十年发现了金钱，现在则发现了成功……按照现在的成功学逻辑，如果你没有赚到豪宅、名车、年入百万，如果你没有成为他人艳羡的成功人士，就证明你不行，你犯了“不成功罪”。

为什么经济和科技的发展、物质的富有带来的却是人类精神的贫穷和困境呢？首先，当我们回顾人类文明史，会看到“文艺复兴”把人从宗教和神权禁





锢中解放出来的一段历史；近代物质文明的飞速发展，却又让作为天之骄子的人类陷入新的禁锢中。科技井然有序地建构、开拓了我们的外在世界，使人类感到空前的方便和舒适，但人类同时也完全陷入其严格的控制之下。最简单的一个例子就是手机。生活中，我们每个人现在最亲密的伙伴就是手机，每天早上醒来第一件事就是拿起手机，晚上也是在手机陪伴下入睡，甚至坐在马桶上也要由它来陪伴。人的主动性和自由精神，就这样在日复一日方便舒适的享受中不知不觉地丧失了。人们在这种物质的异化中变得越来越孤独，亲人和朋友之间的人际交流也越来越少。有太多的人，在赢得辉煌的外在世界的同时，内心却越来越感到空虚和失落。

另一方面，对物质的追求和依赖让人盲目，也产生巨大的压力和不满足。有一本叫《流行性物欲症》的书，其中有这样一段非常经典的论述——“在中世纪，欧洲人的精神支柱是高耸入云的哥特式大教堂，而在当今的美国文化里，唯一能和哥特式大教堂并肩的，便是超级购物中心。像是得了精神上的艾滋病，面对琳琅满目的商品，人们在意志力方面纷纷丢盔卸甲，丧失了免疫力。”为了商业的利益需求，传媒和广告营造了一种物质等同于幸福的假象，鼓荡着人们的欲望。以物质为导向的生活，又会让人们有意无意地去和别人比较。当你住上了100平米的大房子，你突然发现曾经混得不如你的人已经住上了别墅；当你刚想在朋友圈分享去云南的旅行照片，你发现一个同事发了去马尔代夫度假的美图。这种比较带来的不平衡是永恒的，因为世界首富只有一个。如何最快、最多地获取物质资源和金钱，成为人们最关注的事情，也成为人们背负的最大压力。

当赚钱这件事变成人生最重要的部分，人们不再有时间去过悠闲的生活，

去享受美，感知自然。有多少人还能看到生活中细微的美？能够品出一盏茶的回甘，能够发现一朵花的含苞，能够慢慢地看一朵天边变幻的云朵？著名文化学者蒋勋说：“活得像个人，才能看见美。”一个人首先要活出一种滋味、一种兴致，才会有满足感和幸福感，并且自足的状态生成以后，才有可能去奉献美、布施爱。

当一个人认为一切的物质都是工具化的，是为我所用的，就会直接造成一种自大和狂妄之心，缺乏对环境、对自然宇宙的敬畏之心。老牌资本主义国家今日所享用的物质财富，来源于其 500 多年的历史积累，其中的原始积累长达 300 年，而我们的积累才刚刚开始。这就导致了别人 300 年的焦虑，要让我们 30 年内消化。

物质化的社会还造成了另外一个直接的后果，就是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物化和异化。当人们把大部分的精力都放在追逐物质、享受物质的时候，人与人之间的冷漠和隔膜必然出现。不管是同事、邻里之间，还是师生、朋友甚至是亲人之间，人们逐渐丧失了往日的亲密、信赖和相助。在大城市里，没有人能够做到随时开门迎客，款待任何来访者。我们可以很清晰地发现一个现实：在这个物化的社会环境中，人人内心都是孤独的，朋友们在一起的时候，大家都在看自己的手机，面对面也无话可聊。

当金钱比感情重要，道德的标准便会一降再降，“一诺千金”的人甚至会被很多市侩者嘲笑。为了利益，人们不惜出卖一切可以出卖的东西，也正因如此，造假货、说假话都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现象，人与人之间的信任 and 安全感不复存在。诗人北岛在 40 年前曾经在诗中呐喊“我不相信”，如今我们每个人都在日常生活中体味着另一种“我不相信”——我们不相信食品是安全的；我们不相信教

育是公平的；我们不相信媒体是诚实的；我们不相信医生是尽职的；我们不相信官员是廉洁的；我们不相信水是清洁的；我们不相信空气是干净的……唯利是图让人们的信仰只剩下金钱，彼此间的信任荡然无存。

社会学家齐美尔曾说：“信任是社会中最最重要的综合力量之一。没有人们相互间享有的普遍信任，社会本身将瓦解。现代生活远比通常了解的更大程度上建立在对他人诚实的信任之上。”一个人也好，一个社会也罢，想去寻求幸福，必然要建立在对他人和世界起码的信任之上。

（三）城乡协调与中国人的文化根脉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中国梦”理想，既是国家的梦想，更是千千万万普通民众的梦想。中国梦的实现，不仅是人民物质生活的极大改善，更要依托于每一个普通公民能够安居乐业，并且找到内心的安定。从民族性格和文化基因来讲，中国人是世界上最重视“家”的概念的群体，从城市到乡村，建设和打造一个什么样的家园，牵系着每个人的切身幸福和梦想的实现。

关于文化的定义有无数种，其中有一种是这样的：文化是一种包含精神价值和生活方式的生态共同体，它通过积累和引导，创建集体人格。这个定义的解释能力非常之强，几乎可以让我们在最短的时间里明白一种本质，就是一个地区与另一个地区的差异、一个民族与另一个民族的差异、一个国家与另一个国家乃至一种宗教与另一种宗教的差异究竟是什么。

说回到我自己。自从几年前在北师大开设中国古代哲学方面的选修课程，我一直在思考中国古人的思想和智慧到底对我们今人有什么样的意义和价值。传承文化是每个人的事情，很多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继承人，他们所传承的技艺

和手艺是一种有形的、看得见摸得着的传承；而乡土中的风俗、老理儿、规矩、观念等则是一种无形的传承，每个家庭中的门风和家教，是一种最接地气的传承方式。相比之下，前者是形而下的，容易引起人的兴趣和关注；后者则是形而上的，却是真正决定了人的精神价值和生活方式的。

在中国传统农耕文明社会背景里，人与人的关系是亲近的熟人社会模式，个人的存在不是独立的，而是体现在一系列的社会关系中。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就是根据血缘和距离定亲疏，人们习惯于找亲戚、同乡、同学去交往和办事。但是随着城镇化浪潮的席卷，城市的虹吸效应带来了乡村巨大的变化，中国社会已经渐渐从儒家文明框架下的熟人社会走向现代文明的陌生人社会形态。

中国经历了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速度最快的城镇化进程，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从1978年的18%上升到2014年的55%，中国每个月都会有3000个自然村乡村变成城镇。人们住进楼房，用上抽水马桶，看起来过上了一种体面和现代的生活。然而，在貌似繁华的景象背后，我们却不断在发现令人悲哀的问题：城市人群之间的日渐疏离、人与人信任度的丧失、乡村伦理的坍塌、农村留守儿童的教育问题、亲情的缺失……微信圈中被大量转发的农村调查报告，每一篇都在刺痛人们的神经：不管是对于乡村凋敝无力的吐槽，还是痛心的追问，都再一次把乡村很多残酷的问题带入了人们的视野。当然，最重要的是我们在发现这些问题、无奈和罪苦之后，要寻求怎样的改变和解决思路。

农民丧失的家园，不仅是他们的屋舍土地，更是所有中国人的文化家园。家到底对中国人意味着什么？这几十年来，中国人“家”的意义到底有了怎样的改变呢？

陶渊明有诗云：“众鸟欣有托，吾亦爱吾庐。”从文化渊源来讲，中国人“家”

的概念，建立在一种人伦关系的基础之上，与西方社会截然不同。西方文明一贯强调个体价值，向往生命的飞扬和体验，而中国人的精神寄托的主体都在于家庭关系中。《大学》中的八目为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我们不难发现，儒家个人修养和提升的根本目标就在于先去影响家庭（家族），进而再去报效国家和影响天下。也只有中国人会把“国”和“家”两个字如此紧密地关联在一起，叫作国家。西方“国”的概念，无论是 NATION，还是 STATE，抑或是 COUNTRY，强调的不是政体就是土地的边界，只有中国人会把国看成是一个大的“家”。

《国语》曰：“同姓则同德，同德则同心，同心则同志。”家族成员因为血缘关系而形成共同的利益关联与相近的思维观念，彼此之间相互信任、相互帮助、相互扶持，有利于加强家族甚至民族的凝聚力。同时，个人通过家族获得情感和心理上的支撑，感受家族中的温暖与便利，使个人获得社会联系和社会整合，积累和提高社会资本。这种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家族文化已深深地融汇于整个社会关系之中，成为影响中国人价值体系的重要因素。曾几何时，“光宗耀祖”“认祖归宗”这种对家族的认同常被人们挂在嘴边，这种传统的思维模式以及现实中利益的影响，使得传统社会中的人们在很大程度上都把自身与家族紧紧地捆绑在一起。

众所周知，家族和家庭的内涵在新中国建立后开始逐渐改变。到了 1978 年，独生子女政策的发布，让中国的家庭变得越来越小，三口之家成为城市家庭的主流，代际关联也逐渐松弛。说到乡村的衰败，首先是人口的转移。很多乡村只剩下“386199 部队”：“38”指妇女，“61”指儿童，“99”指老年人。经常有人遗憾于中国传统文化中“家风家教”的失落。事实上，人口转移之后，



不仅没有了家族，甚至连家庭都不再完整，留守儿童比比皆是，更不要说三代同堂或是四代同堂。如此的家庭生活，代际互动极为有限，更不要说有何家风家教。如今，我们多数人都是失教的，我们既没有从上一代人身上得到多少教益，也无法向下一代传承经验或是教训。

另一方面，如今人们经常提到乡愁，事实上，乡愁不仅仅是文人的东西，往深里说，乡愁就是对家乡的思念，对生命起源的思念。从现实因素考量，既然中国的“熟人社会”不可逆转地走向了“陌生人社会”，人们不可能再回到以往的地缘意义上的家园，最迫切也最有可操作性的做法，或许是选择性地吸取传统中的文化要素，融合进当代社会的发展与治理模式中。不仅原有的乡村要突破家族姓氏的束缚，强调睦邻友好，在新的城市社区中，也要吸纳千百年来的传统“乡风礼俗”中的优良基因，通过新的“业主委员会章程”或“社区公约”规范管理新的社区共同体，使“家”的理念在“社区公约”中彰显新的内涵，进而提高整个社区成员之间的信任度和幸福指数。

（四）一个跨专业研究课题的诞生，一个地方的示范意义

在我们这样的时代，知识分子应当如何自我定位？这一直是萦绕在我心头的一个疑问。罗曼·罗兰曾说，世界上只有一种真正的英雄主义，就是在认清生活的真相后，依然热爱它。我们无法选择自己的出身、父母，也无法选择生活在怎样的社会环境中，但是这并不代表我们只能等待——尤其是责任更重的知识分子群体。

2013年，冯小刚导演曾经炮轰“开发商没文化”，炮轰那些“加州水岸”“普罗旺斯”“格拉斯”等匪夷所思的洋名，说他们缺乏对中国文化的理解和认同。

这件事情给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

社区的概念原本就发源于西方，其实大家对洋名的追捧背后，是对西方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的向往，但是西化的生活方式真的就适用于中国吗？中国人的文化基因、老祖宗留给我们的生活方式和情感方式，是我们血液里的东西，中国式的社区生活和交往模式究竟应该是怎样的？中国古人的文化传统、价值观念、生活方式等，到底还有多少应该被我们继承和融化在生活中？每个个体的中国人，究竟应该选择什么样的生活方式？

基于以上原因，三年以前，当我获得了北京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处青年教师自主科研项目资助时，就申报了传统文化与中国人的家园建设方面的研究课题。两年多的时间，课题小组搜集整理了大量的文字资料，也关注和实地探讨了很多社区、乡村以及个人化的案例，其中包括：“把农村建设得更像农村”的河南信阳郝堂村；全国首创与业主签订文明公约，致力于建设“没有陌生人”的幸福桃源的福建泉州聚龙小镇；第一家引进国外“社区支持农业”经营模式（CSA）、由博士夫妻程存旺、石嫣开办的北京顺义分享收获农场；以“农村文化礼堂”著称的浙江省湖州市洛舍镇东衡村；自称“幸福运营商”，被外界称为“京郊富人乌托邦”的北京延庆奥伦达小镇；有理想有信仰的“基督小镇”杭州良渚文化村……在对这些各具代表性的新型生活方式、文化传承方式、人际交往方式等观察、比较、思考之后，我们惊喜地发现了让梦想照进现实的更多路径。尽管很多经验和尝试是个性化的，但是有些依托于人的经济实力和人文素养（比如奥伦达小镇的戏剧和油画特色），有些得益于历史的积淀和区域性的风气（比如东衡村曾经出过4个尚书、11位进士）。总体而言，这些具有开创意义的社区和乡村，不仅用自己独特的形式主义吸引世人的眼光，更是一点一滴地积累